

第 5 章

兩代洋儒如何走出中式倫理困局

從莊士敦的事例看，他與「顯公義官員」赫德利用儒家文化、填補現代管理的灰色地帶來杜絕貪污不一樣，屬於「開拓型官員」的莊士敦把中西文化互相優化來開拓理想。換句話說，雖然他們一致認同利瑪竇的「適應策略」和「以德治國」，但他們對如何改善中國「管治專制主觀」和「道德流於表面」的問題有兩種不同反應，赫德採取以長補短、互相平衡、中西合璧的方式，莊士敦則以運用活學活用、靈活變通、時中時西的策略。不過，雖然兩人都十分欣賞中國的傳統學問，可是也發現了儒學幾千年積習已久的倫理困局。讓我們繼續看看，他們分別採用甚麼方法，去打破士大夫幾千年應付不了的問題。

對於中國皇權「管治專制主觀」和官員「道德流於表面」的問題，赫德注意到儒學曲高和寡、過於抽象和並不普及的方面，有學問的士大夫數量在官場上總是不多，¹ 他們往往處於有絕對權力的皇權之

¹ 根據瞿同祖按侯方域的資料指出，一個縣衙雇用的書吏小則幾百至一千人，大則兩三千人；但在清朝 267 年間，進士出身的士大夫人數只有兩萬六千多人。瞿同祖著，范忠信譯：《清代地方政府》（北京：法律出版社，1962 [2003]）。

下、腐敗不堪的中下層官吏之上，所以晚清有政令不達的尷尬，²也有士大夫敢於直諫，卻落得開罪權貴的下場，例如翰林院的陳寶琛和梁鼎芬，因為得罪了慈禧太后，結果被剝奪權力地位，惟有辭官回鄉歸隱。如此忠言逆耳的例子，在歷史上多的是。不過，士大夫是抱擁理想主義的人，必然會以儒家的道德典範作為自己的行為標準，有一套嚴謹的辦事方式，不用別人督促或監管，也會遵從傳統道德禮教做事，正如孔子所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可是，縱觀中國歷史，最高當權者往往不是憑科舉入仕的官員，而是皇帝、後宮、外戚、甚至宦官。負責執行政令的地方官吏也大多不是進士出身，而是靠世族門蔭進入官場。儘管歷代有識之士已不斷進行改革，堵塞了不少招考制度的流弊，但反而令士人變得更加高雅超脫、蔑視權貴的孤傲氣質，令他們幾千年來難以衝破孤掌難鳴的困局。

1866年2月2日，在與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下文簡稱為「總理衙門」）一眾士大夫（包括寶鋆、董恂、恆祺、崇綸、譚延襄、徐繼畲）商談恰克圖邊境電報、吳淞鐵路、³使節派遣等事情的會議上，⁴赫德向他們保證不會做任何令總理衙門不快的事情，並承諾會遵從孔子之道「不可則止」，⁵但董恂卻勉勵赫德不要完全按照孔子的道理做

² 蕭武：〈晚清憲政失敗原因：精英要權力 平民只是旁觀者〉，《書屋》，2010年4月30日，進入網站日期：2016年1月13日，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xiandaishi/special/shehui/detail_2010_04/30/1474735_2.shtml。

³ 英美商人向清政府總理衙門申請，修建由吳淞至上海的鐵路，以便船隻泊於吳淞再以陸路通往上海，避開黃浦江淤塞、大型船隻未能靠岸的問題。

⁴ 總理衙門是《天津條約》簽訂後，西方列強公使進駐北京，為了應付新的需要，滿清政府在1861年3月成立總理衙門，作為中國的外交機構。

⁵ 也可能意指《論語·先進篇第十一》中的意思，即是說自己會做一名「以道事君」的大臣，而不是只會聽皇帝吩咐的具臣。

人，⁶他向赫德說：「哦，不，要按照前半句，『忠告而善道之』去做，但是不要以後半句，『不可則止』指導行動。」⁷當時同治帝載淳（1861–1875在位）未滿十歲，由嫡母慈安太后和生母慈禧太后共同掌權。在這個新的權力架構下，晚清士大夫不再秉承君臣倫理的愚忠，但他們卻不想自己提出改革，赫德正是他們心目中最理想的代言人，所以董恂向赫德說，如果別人不聽從，也不應罷休，不要理會孔子「毋自辱焉」的告誡。赫德當然明白董恂這番說話的含意，也發覺士大夫之間有黨派之爭，許多事情董恂等人不便公開發表意見。赫德因此在日記裏這樣寫：「今後在他們面前說話做事真的要謹慎小心。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對一個人冷落，便激怒了所有的人……對一個人友好，便取悅了所有的人。」⁸赫德開始明白中國的官場生態，士大夫坐不穩，就是「不會做人」，最高級的士大夫能夠處於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就是皇權貴族看中他們的清高和愚忠。反過來看，一些能夠成為數朝元老之士大夫，其實是已經磨練到既謙謙君子、又圓滑老練的地步，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就說過董恂是「我所知道的最有成就的說謊者」，⁹不過太過圓滑老練的話，說話便不夠真心和直接，理想就會變成空談。就是這原因，滿清的改革遲遲未能進行，也是多年來士大夫心有餘力不足、充滿理想卻不敢行動的尷尬境況。不過，自從幾年前六歲小皇帝同治帝即位後，董恂

⁶ 董恂就是受派遣代表滿清政府與歐洲各國簽訂通商條約的全權大臣。

⁷ 出自《論語·顏淵》，進入網站日期：2015年11月20日，<http://zhonghuawm.com/contentxuup8897>。

⁸ 司馬富等人編，陳絳譯：《步入中國清廷仕途：赫德日記（1863–1866）》（北京：中國海關出版社，2005），頁445。

⁹ 《董恂的待客之道》，《時拾史事》，進入網站日期：2015年11月20日，<http://chuansong.me/n/747702>。

等人終於等到不用向皇帝婉轉說話的一天，也正是士大夫可以做一番大事的時候了，不過同治帝背後的皇權仍然專制主觀，1865年3月5日（同治四年）恭親王被彈劾，以「攬權納賄，徇私驕盈，目無君上」為理由，慈禧太后把恭親王的「議政王」頭銜革除掉，雖然各大臣求情為恭親王保住了總理衙門首席大臣一職，但自此一眾士大夫對改革不敢再公開表態。

面對這個中國幾千年來君臣倫理的困局，赫德覺得自己可以助總理衙門一臂之力，做一些總理衙門不敢做的事，藉此實踐儒家的「大同社會」和「天下為公」，追求比「社會公義」更高更大的理想。恭親王被革除「議政王」頭銜後不久，赫德在1865年11月6日向總理衙門呈上《局外旁觀論》，他認為中國官員「盡職者少，營私者多」，軍隊「平時拉弓舉石，只講架式，股肱怠惰，止得養鳥消遣」，知識分子「書籍非不熟讀，詩文非不精通，使之出仕，而於人所應曉之事，問之輒不能答」。¹⁰ 因此，他建議中國應學習西方的長處，整頓財政和加強外交，而最關鍵之處就是提升官員的質素，例如高薪養廉、本省居官、明理為官等等。《局外旁觀論》對改善文武官員有以下方案：

文之要惟各官俸祿。各等官員，應予以足敷用度定數，不致在外設法得錢。陞官加俸，查明署內應用人若干，並准

¹⁰ 詳細內容是：「政治上：『盡職者少，營私者多』。財政上：『官之下取於民者多，而上輸於國者少』。軍事上：軍隊『平時拉弓舉石，只講架式，股肱怠惰，止得養鳥消遣』；『兵勇之數，動稱千百萬，按名排點，實屬老弱愚蠢，充數一成而已』。知識界：知識分子『書籍非不熟讀，詩文非不精通，使之出仕，而於人所應曉之事，問之輒不能答』；『一旦身居民上，安能剔弊厘奸』。」轉載自李揚帆著：〈別了，羅伯特·赫德！〉，《晚清三十人》（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8），第二部分，第27節。

開銷經費……武之要在兵精不在多，兵法兵數兵餉，均有應改，各省若有兵五千人，常留營內操練，不准出外謀生，十八省不過九萬之多。比此時百萬，得力而省，京師另養一萬之數，此費可於洋稅扣滿四成之後支銷。再文武應准本省居官，為官係明理之人，在本省熟悉風俗語言，若署內有舞弊，較外省來人，更易查出，其餘一切事宜，日後可隨時設法整頓，必致國安民富。

赫德敢膽向總理衙門呈上《局外旁觀論》，當然除了得到董恂等士大夫鼓勵之外，也因為自己有前英國官員的特殊身份。不過，這兩點只能幫助恭親王向上條陳奏請兩宮下旨，命令各沿海督撫及通商大臣研究改革建議。但如果赫德要真正令皇權和保守官員相信自己的話，就要讓朝廷上下看到《局外旁觀論》的作者，是個謙虛十足的（洋人）士大夫，也是個道德清高、一心為滿清政府做事的（英國）人。故此，赫德不時警誡自己小心做事不能犯錯，他經常在日記向上帝立志做個「思想純潔、說話誠實、行為正直」的人，¹¹也要向幾千名關員示範自律的重要性。例如1873年4月赫德就曾因為自己失察，沒有查驗出一個副稅務司失職令海關損失了23,000兩銀子，惟有用自掏錢包填補這個虧空。¹²赫德除了要求每個關員按照海關規則嚴格執行任務，也設計了一套讓朝廷上下不用猜測中國海關有否如實上繳關稅的系統。正如司馬富、費正清、布魯納在《赫德日記》中指出：

¹¹ 司馬富等人編，陳絳譯：《步入中國清廷仕途：赫德日記（1863–1866）》，頁443。

¹² 袁騰飛著：〈晚清中國唯一的「零貪腐」衙門〉，《袁游》，進入網站日期：2016年2月12日，http://ding.youku.com/a/id_XNDAzNzY=.html。

每個口岸由一名外籍稅務司為首、配備外籍助手（洋班幫辦）和中國文案、司事及其他下屬，組成海關內班，致力於一個充滿吸引力卻十分有限的目標——確定按照稅則應納關稅，並證明稅款已繳入清政府海關監督（通常為地方最高官員道台）指定的海關銀號。外國稅務司署自身並不收款。它只告訴北京各口岸每一季度收到若干。一直到1910年赫德去世以後，事實上，到1911年清朝結束之時，這一做法始終是海關成功的基礎。¹³

呈上《局外旁觀論》、廉潔管理中國海關、利用洋稅支持中國改革等等措施，就是赫德幫助總理衙門巧妙避開慈禧太后的「管治專制主觀」，讓士大夫的理想變相付諸實行，不再被困於被皇權操控的尷尬局面，也可以自行招聘和培養關員，把德行實踐與職業升遷掛鉤，避免「道德流於表面」的問題。

莊士敦對待中國的「管治專制主觀」和「道德流於表面」則另有一套對策。他沒有把皇帝和士大夫不足之處放在心上，卻反過來把他們優秀的地方發揚光大。莊士敦看見儒學其實是一套生活智慧，對淨化人心和改造社會非常有效，只是中國幾千年來讀聖賢書並不普及，有機會學習孔孟之道的人不多，而且大都以考取功名為目的，並不是為了學習做人的道理。就算是1911年滿清被推翻後，一群受過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竭力把知識普及化，提倡書報採用與口語相似的白話文，認為如此可令更多人看懂文章，更有效普及知識，但傳統道德卻變得空白，舊中國的禮教蕩然無存。莊士敦對此

¹³ 司馬富等人編，陳絳譯：《步入中國清廷仕途：赫德日記（1863-1866）》，頁18。

覺得非常可惜，中國正走向西方道德淪亡的舊路，雖然莊士敦不再相信基督教，但在公學的「宗教和道德最重要，紳士風度和男子氣概第二，知識才第三」理念下，他把中國傳統道德放在很重要的位置，認為學習白話文對改善惡習沒有幫助，民眾仍然缺乏公德意識，做事照舊依靠裙帶關係，社會不能進步，所以莊士敦認為要把中國傳統的仁愛、惻隱、正直、誠信等適用在社會人際關係的公德好好保存，不應把西方強調自私自利的「消極自由」硬套在中國人身上。中國落後的真正原因，不是被資本家剝削，也不是知識沒有普及，而是儒家的社會道德沒有真正的大眾化，孔孟之道沒有被視為人人應學的生活智慧。所以莊士敦有以下論述：

不僅在中國的文化及宗教中，而且在中國的社會結構中竟然存在著如此眾多的真正值得欽慕和保存的東西……無論東方還是西方都處在各自社會發展的試驗階段，因此，不管對哪個半球而言，把自己的意志和理想強加給另一方是不明智的，同樣，快速放棄自己的獨有的理想則是危險的。¹⁴

1912年，看見康有為和陳煥章組織「孔教會」，莊士敦如獲至寶，馬上以外國人身份捐款，對能夠加入「孔教會」覺得非常榮幸。與另一位加入「孔教會」的洋儒李提摩太 (Timothy Richard) 一樣，¹⁵

¹⁴ 鄧向陽編：《米字旗下的威海衛》（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3），頁37；王嬈著：〈《1901年樞密院威海衛法令》與英國在威海衛的殖民統治〉，《華東政法大學學報》，第2期，總第57期（2008），頁155。

¹⁵ 李提摩太是英國傳教士，他在《孔教論》作序，說中國有賴孔子，才成為「敦化最著之邦」。

莊士敦認為中國有賴儒學，故此成為「敦化最著之邦」。同一道理，莊士敦十分認同梅光迪、胡先驕等人的新人文主義理念，這群留美中國學生提倡以儒家道德構建理想社會，所以在1922年1月出版《學衡》雜誌後，莊士敦馬上把這本反對西方個人主義、抗拒極端自由主張的刊物給予溥儀閱讀。1934年，莊士敦回到蘇格蘭後買了三個小島，佈置成為一個中國陳列館，放滿溥儀賞賜給他的古玩、書畫、瓷器等中國藝術品，每當有親友到來探望，莊士敦便穿上清朝一品官服，把滿洲國國旗飄揚起來。要合理解釋莊士敦在蘇格蘭建造「小中國」的行為，從他在香港當總督私人秘書、威海衛當「父母官」、北京當帝師的行徑和作風來看，莊士敦不是精神有問題的人，也不貪慕虛榮或喜歡炫耀地位。所以與其像一些文章以「怪人」或「念念不忘」來形容莊士敦，倒不如說因為近距離見過拜金主義的英國社會、歐洲列強在中國的野蠻行為，英國透過帝國主義和殖民地政策欺負中國，莊士敦實在感到不好意思。故此他排斥西方崇尚物質的個人自由主義，多年來在威海衛過著非常樸素的生活，只因為抱著贖罪心態，希望以外國人身份做好榜樣，也藉此鍛煉佛家體悟本心的功夫，並身體力行以洋儒姿態出現。從1904年5月至1919年2月這14年多，莊士敦在威海衛實踐孔孟之道，為中國開拓精神文明，盡心盡力做個中式「父母官」，擔任裁判官審案時循循善誘，用心向民眾講解中國古代哲人的做人道理；又在北京擔任帝師的時候，教導溥儀成為一個開明的君主，希望小皇帝明白「以德治國」的好處，尤其必須從最高權力的階層先做起。莊士敦不斷為中國人多做點好事，晚年在家鄉建造「小中國」，只是延續「開拓型官員」的邏輯，向世人展示儒學如何補充現代科學的精神道德缺失。莊士敦幾十年的儒學實驗告訴全世界，相比英式管治用法律來約制

人的行為，用中式儒學來教化人心更為有效，如果人人都是儒生或文化人，知書識禮的心態，不再是為求官名利祿，而是改變這個世界，為人類謀求幸福，便能解開中國人「管治專制主觀」和「道德流於表面」的困局。

讀到此處，大家可能不明白的是，既然儒學的道德和理想如此偉大，孔孟的生活智慧對管治那麼有效，為甚麼晚清士大夫卻偏離孔子的道理，反而改推「洋務運動」？為何民國時期知識分子以為單憑知識便可以救國，不再重視儒學的生活智慧，把中國的傳統道德拋諸腦後？所以下文我們須要比較一下，中英兩國傳統文化的轉折點，便能解開儒學淪落之謎。

中文大學出版社：具有版權的傳統